

04.08



左权文史資料

政协左权县委员会

第四期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4月25日



左权县八年抗战始末記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逞其虎狼之威，疯狂进犯，先后占据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邢台等华北重要城市。素以惯打内战著称之中央军、晋绥军仓猝应战，望风披靡，变为逃兵溃卒，窜奔各地，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呻吟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二十余年暴政统治下之辽县人民突遭巨变，御侮有心，自卫乏术。警报频传，一夕数惊。当此水深火热，颠沛流离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八路军渡河北上，提出与华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誓不退过黄河等坚决抗战主张。十月初，一二九师进驻辽县，一面肃清溃匪，安抚流亡；一面派遣干部协助地方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民气为之一振。特别是三八年四月，粉碎敌九路围攻，三九年一月，击退敌三路进攻两役，县城失而复得者再，广大人民更确立了持久抗战最后胜利信心。从此，军民一心，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改造旧政权，成立各种救国团体。在实行减租减息，增资政策下，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抗日积极性亦同时提高。

日寇既陷武汉，深感后方威胁，集中优势兵力，会师华北，扫荡敌后，华北既(即)

转为主要战场。国民党又向敌暗送秋波，坐观成败。我辽城及平辽公路乃于三九年七月五日第三次沦陷敌手。同时，我辽县抗日政府即移驻路东。旋又增设路西办事处，以便领导。至此，敌我斗争便进入短兵相接，尖锐与复杂阶段。四〇年春，敌进陷榆社，并在寒王、突堤、石匣、小岭底、管头等地修筑碉堡，派兵驻守，路西领土又被分割为南北两块。八月下旬，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收复榆社，挥师东进，荡平县境内所有碉堡，直逼县城，人心大为振奋。未几，敌施行报复，向我根据地连续扫荡三次，残毒空前。四一年春，敌又修筑洪度炮台，扩编伪军，收买汉奸，组织特务，奔袭包围，捕捉杀害我干部和人民，实施其蚕食政策。在敌血腥屠杀与威胁诱降下，形成路西大部、路东距城十五里内村庄暂时维持局面。若干民族败类，如刘显荣、秦麟翔、李金才之流，不惜颠颤事仇，为虎作伥。在维持区则发展新民会，对根据地则发展伪国民党，妄图逞其出卖祖国，反共反人民之滔天罪行。一时形势恶化，抗日干部与人民之被捕被杀，日有所闻。我工作人员在敌游击区活动，日必徙居数村，夜则露宿山坡窑洞，虽饱尝风寒暑热之苦，冒枪林弹雨之险，甚至牺牲流血，然从未有向敌屈膝者。

四一年八月，路西正式改为辽西县。从此东西分治，互相策应，形成对敌夹攻之势。同时又建立县、区、村各级武委会，民兵组织得到普遍发展。四二年初，对敌展开全面的，长期的反蚕食斗争，打垮维持，封锁敌人于城周十里内。敌据点下之村庄与关厢里伪军、伪组织内部，均能进行抗日活动。腹心区则贯彻减租减息法令，进一步发动群众。在人民生活改善，思想觉悟基础上，群众更加武装起来，对敌伪威胁亦随之而加强，并为四四年以后大生产运动造下有利条件。是年，敌犹妄图挣扎，曾由各地抽调大量敌伪军，配合其特务爪牙，于二月及五月向辽东进行两次毁灭性的大扫荡，实施其“铁壁合围”与“三光”政策。十月间，又向辽西进行二十余天的反复清剿。但不论敌寇如何残酷与凶暴，均在我民兵的麻雀战、地雷战与配合八路军的游击战、运动战打击下，遭受到惨重的挫败。

在四二年五月反扫荡战争中，我们亦曾付出相当的代价，即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竟于麻山之役因掩护群众退却而光荣牺牲。噩耗传来，全县人民悲愤激昂，誓死要为左权将军报仇，并提议改辽县为左权县，永作纪念。嗣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于是年九月十八日在黄漳举行改县命名典礼大会。旧治辽县从此遂改称左

权县。

敌寇于军事进攻失败后，又图加强其特务统治，制伏我民心，乃于四三年五月，自晋阳调其特务头子清水利一来辽专主其事。时值五月扫荡，魔炳勋、孙殿英二逆投敌之后，敌特、国特完全合流。清水驱使其残毒的特务队，不分昼夜奔袭突击，包围我边沿区，尤以扶峪、寨沟、竹宁、川口、狮岩、前龙、沐池等村为最甚。我边沿区人民不甘受敌伪蹂躏，相率携妻带子，抛弃家园，避入根据地。结合基干武装，组织民兵联防，一面战斗，一面生产，进行顽强抗拒。七月以还，全县展开反特务斗争。伪国民党、伪新民会组织机构悉被摧毁。许多失足和上当分子，在我抗日政府教育与宽大政策争取下，纷纷觉悟与回头。于是，敌伪阴谋又一次遭到我沉重的打击。

一九四三年，又是灾荒最大的一年。由于连年敌寇摧毁与亢旱，旧存既空，新收大歉，人民吃糠咽菜，均感来处不易。在政府有计划的发放救济及组织生产、提倡节约下，全县并未饿死一个人。四四年秋，飞蝗入境，咀食田禾，下庄至新店一带受害颇巨。又在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下进行捕打，最后一次圪道村的歼灭战，胜利地结束了太行山区的剿蝗战斗。四五年春，继续组织群众刨蝗卵，捕蝗蛹，在根除蝗害上曾起决定作用。于是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所无法应付之蝗灾、旱灾，在我们组织起来，群策群力的奋斗下渡过了。我们不仅能战胜人祸，并且能征服天灾。因此，广大人民不但有了高度战胜敌人信心，而且感觉在共产党领导下，尝到无限的生活兴趣。同时，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两年的努力，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组织在互助组、变工队、劳动社、合作社、纺织小组等组织内，并涌现出各种英雄模范和能手四百余人。领导人民深耕细作，发展副业，向耕三余一，足衣足食方向迈进。

在军事上，四四年经我两次猛袭洪度、其至等炮台后，敌伪统治顿呈不可收拾状态，辽城亦随之而陷于我军民长期围困中。终于四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我朱德警卫团、左权、辽西两独立营及两县民兵围攻下，敌伪狼狈北窜，沦陷五年又九个月二十二天之辽县城乃告光复。八月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四年来，左权、辽西两县分治局面于十一月一日正式合并，复归于一，并定名为左权县。

左权县八年抗战经历，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斗争史。综合八年中全县损失，在人口方面：被敌杀害者三〇二七口，因战争罹疾受冻挨饿而死者七三九四口，被敌俘去三二

八口，逃亡失踪三九七口，负伤六〇九口，残废不能劳动者四八五口，共计一二三四〇口，占现有人数九二三四二口的百分之十三强。房屋被毁四二三六二间，抢去衣服三五八一九四件，抢去粮食五〇八三七八二石，对敌负担粮五〇八三六〇石，款一五一二二五〇元，给敌支差苦力二八五一〇一个工，损失农具一九九五〇件，损失家具及其他资财价值三四八九五二八二六元。家畜方面：损失牲口一三八六四头，猪六〇七口，羊一八八九五只，鸡八七三七五只，蜂八二五窝。工业损失一七六一四三四元，商业损失一三五三四二九四元，矿业损失七一六六三四元。

特別使我们最感悲痛，而且也最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八年来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及战士、民兵，自左权将军以次，计牺牲七九五人，其中共产党员三十二人。他们都是抗日战争中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战场上，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国家、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发扬中华民族之凛然气节。在他们的感召下，激发了后死者的敬慎心，继续奋斗，终至战胜敌人，收复失地，使衰老的中华祖国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全县人民感激他们的功德，敬慕他们的志行，特就昔日万寿宫遗址，兴建烈士园，题诸先烈英名于碑碣，留作永久之纪念。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可是，当抗战期间退到峨嵋山上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又卷土重来，高喊接收主权，收复失地；在东北、在华北、在华中、在华南，到处燃起内战的烽火，向人民开刀，抢夺胜利果实。日寇投降将近一年，虽经数度谈判，中共一再忍让，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者支持下，总是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以致和平民主迄今未能实现。

我们知道，和平、民主的到来是肯定的；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必须用斗争才能求得和平、民主的实现与巩固。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烈们的遗志，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向反动派们作顽强不息的斗争，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

（录自左权烈士陵园碑记）

回忆彭副总司令二、三事

豈登考

我是一九三九年十月调到“前总”机要科工作的，主要是保管军事地图，有时也给首长眷写些机要文件，这使我有机会接触首长，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现将多少年来铭记心头的彭副总司令的几个故事追述如下，以表怀念之情。

一、好学不倦

彭副总司令为人耿直，好学不倦。我去他寝室给他挂地图时，经常遇到他手不释卷地在看书。他床头上摆着好多书，有《辩证唯物论》、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还有孙武子兵法的原著及译文等等。有时他不在家，我看见他床头上堆着他写下的密密麻麻的许多读书笔记和心得，以及对书报某些问题的看法。有的还用红蓝铅笔勾画了圈点。他常和秘书刘文华争辩军事问题，声音高吭善辩，对方没有充分依据辩住他时，他是不轻易改变自己看法的。他也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觉得别人见解高一层时，便在自己寝空踱来踱去思索揣摩。当豁然开朗时，他总是又说又笑，侃侃而谈。彭副总司令不仅自己酷爱学习，他还经常关心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学习政治。有时当面向你几个问题，当你答不出来时，他就耐心地解释。并且诚恳地告诫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嘛，不要埋头在事务堆里，一天要挤出几个小时专心学习，只有学习好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二、把稿费缴了党费

我记得有一次刘文华给我拿来草稿，让我眷写，这是彭副总司令所写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彭总在用字用词上很讲究，总要反复推敲修改。我眷写的那一部分，由于疏忽大意，有的地方没有用对标点，他重新校阅后，把我叫去，和蔼地对我说：“标点符号非常重要，用错了就把意思改变了。我们写文章，是要叫人看的，必须细心，不能

粗枝大叶，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必须遵循的。”他这本书出版后，得了稿费大约十多元。当他拿到稿费后，没有私人享受，全部作为党费上缴了。

三、经常亲临前线

彭副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为战士所熟知。每次作战，他除了听参谋人员汇报情况外，常常亲临前线视察，特别是和敌人接火后，他常到前面亲自指挥。我记得敌人打荡失败后，在关家嘴打了一仗。在这次战斗中，我背着地图在第二道防线等待首长使用。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火力交叉射击，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打了老大功夫，未能把敌人火力压倒。彭副总司令心急如焚，“这是什么问题？”他要冒着危险上前线，警卫人员阻拦他。他说：“我要亲自看一看。”他通过现场侦察后，调来几门炮，把敌人临时碉堡摧毁，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最后彻底消灭了敌人。彭副总司令总是在两军激战到紧要关头，把生死置之度外，亲自到前线检查指挥，一直到战斗的最后胜利，给全军指挥员做出了表率。

四、关心人民疾苦

彭副总司令除指挥作战外，在驻地，常挤时间找老乡座谈，了解群众生活情况，从中指导群众生产。四一年“前总”迁来麻田后，彭副总司令看到麻田这样好的水利条件，没有利用起来，于是动员了参谋科、机要科、后勤科人员帮助群众修水渠。有一天午饭后，突然找不到彭总，警卫人员在上、下麻田跑了几趟也找不到，非常着急。后来找到修渠工地，见彭总赤着脚，挺着腿在那里修渠。参谋科闻讯后，马上吹了集合号，全体人员都下到河滩修渠了。在彭总带动下，水渠很快修成了，并且还修了个人力带水水车，进行提水灌溉，一次能浇地好几顷。

五、不吃小灶饭

彭副总司令经常指挥战争，紧张时，往往通宵不眠，身体逐渐消瘦下来。芜湖单位支部（参谋处党支部）决定给彭副总司令另立小灶，增加些营养。彭总知道后，马上叫去芜湖单位朱指导员说：“你们怎能这样做，现下敌人还没有被打败，我们还没有把敌

寇驱逐出中国，就说把敌人打出去，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历来是和群众同甘苦，我怎能特殊？”这个决定被他否决后，以后再也没有人这样提议了。就连他的亲属来了，也同样是吃大灶饭。

六、改善大灶伙食

彭副总司令不仅是个军事指挥家，而且是一个生产能手。在四二、三年困难时期，彭副总司令号召“前总”干部战士都要生产自给，最起码也要生产够半年吃的粮食，减轻群众负担。彭副总司令带头种了一亩菜园，从播种到收获，什么时候整地、施肥、浇水，他都懂得，样样做得都很认真。别人种的茄子一般结到七个就算不少啦，他种的茄子每株结十一个。别人种的西红柿也都没有他种的大。到收获的时候，他的收获物总是占第一位，他收下的果实全都交给了大灶伙食管理员，改善大灶伙食。

略談左权县在抗日战争 时期的群众文化工作

杨凤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逞其虎狼之威，长驱直入。我县县城曾三次沦陷，全县人民备受日寇铁蹄之践踏，蒋阎溃兵之蹂躏。不少村庄惨遭血洗，幸存之民也是流离失所，一夕数惊。

正值左权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八路军渡河北上。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蔡树藩等将军率一二九师进驻左权大地，协助地方党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抗击日寇，肃清溃匪，成立抗日政府，安抚流亡，建

察小分队，而且是日寇的队伍。因为按往常经验知道，伪军人员没有这个狗胆，敢于钻到八路军的眼皮底下。我立即打电话向左参谋长汇报，他指示说：“立即派出小分队搜查一下，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当夜后半夜，我们小分队抓来了一个反动伪村长，通过审问了解到，不出所料，这支部队是日寇扫荡挺进支队，专门负责侦察我军情报。同时获悉，辽县日军已经倾巢出动，准备经拐儿岭、上、下交漳和松树坪分三路向麻田奔袭。情况紧急，我决定趁敌人大部队未到达之前先敲掉这股挺进支队。结果，第二天攻了一天，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弹药充足，而且事先有准备，没有攻下来。黄昏以后，这股敌人借夜幕向武军寺、麻田方向流窜而去。我考虑到：敌人带有电台，万一他们发现我总部及北方局行踪，敌人大部队很快会通过电台获悉和掌握我军动向，我军则随时有招到敌人消灭的危险。想到这，我立即打电话报告总部，接电话的是左参谋长，我向他谈了我的建议。记得大概讲了两点：1、这次总部转移要打破常规，不要向南、北艾铺，十字岭等无人山区转移，因为那里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应出其不意转移到榆社县或武乡县的洪水镇、左会村等方向离敌人据点很近的地区，依靠革命群众和老百姓作掩护，在敌人身边隐蔽，反而不会引起敌人注意。2、采取分散隐蔽、化整为零的方法。左参谋长当即回答：“不行了，改变不了，彭总已带着三大部和北方局机关往北艾铺方向去了，现已到了郭家峪。”随后命令我警卫团继续监视敌人，有情况随时报告。这时我才知道左参谋长是最后一个离开麻田。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要在桐峪，上、下交漳和王家峪等一线山地修起临时工事，部署好兵力，严阵以待，准备阻击敌人的进攻。一切安排停当后，我这个总部警卫团一团之长，对员都是否能安全转移，总是有点放心不下。翌日拂晓，我带领团骑兵通信排飞速赶到麻田，想当面向左权参谋长汇报我们战斗准备情况，并想接应总部往洪水方向转移。到达麻田，左参谋长已追赶队伍去了。我们立即马不停蹄，朝北艾铺方向过去。经第25军走到南艾铺和羊角之间的二座山脊上，猛听到山下一阵枪响。由于天未亮，看不清。开始我以为是敌人已深入进来了。心想：糟了，可能总部已被包围！但仔细一听枪声不烈，且多使用的多是刺刀子，枪声啾啾作响，较沉闷，而此时响的却是乒乒乓乓的汉阳枪，我立即肯定是我们自己人，但不知为什么开枪。下了山，枪声停止。不一会儿，

歌曲不仅在根据地唱，在敌占区、甚至在敌人的据点内也广为流传。左权县抗日政府编印的“敌区人民诉苦”、“伪军十大悩み”等民歌，由于诉说了敌区人民之苦及当伪军的可悲下场，很动人心，则在敌据点内传播。所以革命歌曲和革命民歌既是革命的号角，催征的战鼓，鼓舞人民勇往直前，又是一支支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人们称赞群众文化工作是一支不拿枪的战斗队，在当时确是当之无愧。

书写抗日标语、漫画，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根据地、敌占区极普遍的一种宣传活动形式。群众用茅草束起来当笔，拿红土、粉土、锅底黑作颜料，以墙头、路口作场地，以当时当地党的各项工作要求为内容，经常大量地书写，十分振奋人心。在敌人占领区，我们写，敌人刷，越写越刷，越刷越写，对群众印象越深、影响越大，就像一个阵地的争夺战一样，敌我双方反复争夺，可见其作用之大。

散发抗日传单，藉以传播战争胜利消息，号召人民做好各项工作，简明、扼要、方便，是一种极简便的宣传形式。

戏剧及各种文艺节目演出，多在战争间隙进行，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极为活跃的一种群众文化活动。如弓家拐村距敌占县城仅十三华里，距敌人炮台只有七、八里，但这里的业余剧团经常进行演出。演出之日，当地民兵武装保卫，敌占区的群众也偷偷跑来看戏，因其内容都是反映战争与工作的，使群众既享受娱乐，又深受教育。一九四四年，在全县群众文艺会演大会上，他们演出的“血海深仇”，荣获戏曲表演的第一面奖旗。

(三) 对各种民间文艺形式进行有组织、有领导地改造与运用，使之服务于战争，服务于人民。

鼓书、旱船、竹马……在左权有十几种传统的文艺形式，人民政府均加以改造与运用，赋予新的内容。在旧社会，竹马是扮演汉代刘、关、张与吕布虎牢之战的节目，我们就把它改变为八路军骑兵英勇歼敌的故事。旱船是一女子坐船，船夫划船的故事，就改造为运送军粮及枪弹支援前线的故事。各种艺术形式都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以传统的形式，革命的内容去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小花戏，是左权特有的一种歌舞小戏，为群众所喜爱。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便对其改造工作下大功夫，保留其特有的艺术特点，编写了“新告状”、“走娘家”、“四

季生产”、“练武”等适应各个时期战争、生产、生活等要求的节目。抗日政府还每年组织他们在全县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观摩演出，以推动花戏的改革，使之逐步提高，更好地服务于中心工作。

(四) 处于敌后之敌后，前线即后方，后方亦前线的情况下，党特别加强了战地宣传工作。如一九四三年五月，左权县粟城区反扫荡战争开始时，区、村各级指挥部均派出支部副书记一名，组织战地文艺宣传队。仅一个月时间，全区就在街头、路口书写大幅标语二百余条，组织小分队深入到群众转移的深山峡谷，口头宣讲战争形势、胜利捷报、战地纪律、怎样为战争服务等达三百余次；还通过各种形式，表彰本区反扫荡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一百余名；并在战斗间隙，组织军民联欢会，文艺演出会十余次；宣传队员还在群众中及支前队伍中及时地进行各种战地鼓动工作，使人们虽生活在紧张的战火环境中，但头脑清醒，目光敏锐，生活愉快，斗志昂扬。

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虽然生活在战斗、生产、工作、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但群众文化活动非常活跃。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像抓政治、经济、军事一样抓群众文化工作。

第二是有县、区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直接辅导。如一九三八年县学救会办了“抗战报”，成立了“抗日先锋宣传队”，后来又成立了“民众教育馆”，他们除直接进行宣传活动外，也做了辅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大量工作。另外，当时县内一些群众文化活动的老前辈，如李祥林、阎廉甫、皇甫束玉、郝乃武、胡之锐、路云庆等同志，均花大力气直接、间接地从事了群众文艺活动的改造、推广、辅导工作，使左权群众文化活动日新月异，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

第三是各项群众文化活动均产生了直接的效果。通过它，直接服务了抗日战争的需要；通过它，改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通过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通过它，发展了革命的新文艺；通过它，满足了群众在战争环境中十分缺乏的文化生活要求，成为人们在精神生活上的有力支柱。

第四是有广大群众的自愿参加。人们在艰苦的斗争中，都积极参加自己喜爱的一项或几项文化活动。所谓服务于中心工作，实际上则是及时解决群众在各个时期最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满足群众对现实生活的要求。

第五是群众文化活动和生产的关系处理得当。他们真正运用了战斗之隙、生产之余、工作之间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土打土闹，一切靠自己动手解决。乐器自己制，经费自己筹，内容自己编。自己闹文艺，自己享受文艺。因而群众对搞文化活动有高度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左权老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群众文化活动之所以十分活跃，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我八路军前敌总司令部驻在麻田镇一带，达五年之久，全国各地知名的新、老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左，给敌后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罗工柳同志在悼念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清漳河是我熟悉的地方，麻田是我喜爱的村庄，那里有街市、教堂、田园、河流、树林和奇峰……。那里曾经开过展览会，座谈会，高尔基、鲁迅的纪念会，五四运动的纪念会……。特别显得美丽的，是那里有文化俱乐部，文化食堂，文化旅馆和作家之家。那里聚集了边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紧张地为人民制造精神的食粮。在那堆，我们曾经选举过文化村长……。麻田是我喜爱的地方，我曾经快乐地生活过、紧张地工作过的地方。”

事实正是这样：有这样一大批知名的新文艺工作者生活、工作在这里，他们经常深入生活，经常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他们在总部驻地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他们经常为群众生产着各种文化食粮，歌曲、画页、小戏、书刊，各种文化宣传资料应有尽有。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左权县新文艺运动、群众文化活动的推动者、支持者、辅导者。在他们的帮助下，左权这块抗日老根据地，群众文化活动一直在健康地、蓬勃地发展着。